大理的三座“三塔”

□ 杨士斌 文 / 图

大理除了闻名遐迩的崇圣寺三塔、洱源牛街梅城三塔外，在凤仪米总村东面的东山之上，也曾矗立着一座三塔。

一千多年前，洱海周边三座“三塔”的同期建造，并非偶然，而是与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。三座三塔既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深刻内涵，也寄托着大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成为“妙香佛国”的重要象征。尽管它们的命运截然不同：崇圣寺三塔完好如初，历经千年仍青春永驻；梅城三塔主塔尚存，南北小塔风化不存，见证着山川变迁与历史沉淀；凤仪东山三塔则彻底倒毁，仅留遗址供人凭吊，但它们同为佛教文化传承的历史见证。

三座“三塔”虽规模、建造细节与历史遭遇各异，但均承载着大理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具有多重价值：建筑艺术上，它们融合了中原技法与本土特色，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创新精神，是“天人合一”理念的实践典范；宗教文化上，它们见证了南诏大理国至明清时期佛教在大理的盛行与传播，反映了宗教与社会、民俗的深度融合；历史研究上，它们为还原大理地区从南诏、大理国到元、明、清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状况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，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；旅游价值上，它们以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吸引着万千游客，成为大理旅游的核心资源，既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，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。

大理的三座“三塔”，是穿越千年的历史巨人，是大理人民智慧与情感的结晶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中的一分子。在新时代，我们应加强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研究与传承，让它们在岁月长河中继续闪耀璀璨光芒，向世人诉说大理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魅力。

在玉带云游路远眺三塔（1998年2月23日摄）。

崇圣寺三塔：岁月雕琢的历史丰碑与文化印记

崇圣寺三塔坐落于点苍山应乐峰下、洱海之滨，由一大两小三座佛塔组成，大塔名千寻塔，南北两座小塔分立两侧，呈“品”字形布局，雄浑壮丽，气势恢宏。

千寻塔高69.13米，为典型的密檐式空心砖塔，共16级，是中国现存偶数级密檐塔中最高的一座（据云南省文物局2020年公布的实测数据）。塔身造型端庄秀丽，线条流畅，自下而上逐层收缩，呈现出优美的韵律感。每层正面中央均设佛龛，内置佛像或菩萨像，虽经千年岁月侵蚀，部分造像已损毁，但残留痕迹仍能印证当年的精湛工艺。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金翅鸟，这是大理地区特有的佛教护法神，既具装饰功能，更蕴含“镇水避灾”的宗教文化寓意（《大理国史略》载，金翅鸟为“迦楼罗”化身，可镇服洱海龙妖）。

南北两座小塔均为10级，高42.19米，属八角形密檐式砖塔。它们与千寻塔相互呼应，建筑风格既保持整体一致性，又各具特色：小塔塔身装饰更为细腻，每层檐下均有精美的浮雕与彩绘，题材涵盖佛教故事、瑞兽图案等，展现了大理国时期高超的雕刻与绘画技艺（大理州博物馆藏小塔残件考古报告佐证）。

崇圣寺三塔的建造跨越南诏与大理国两个时期：千寻塔始建于南诏劝丰祐时期（公元824-859年），约公元836年正式动工，历时20余年竣工；南北小塔则建于大理国段正明至段正严时期（公元1096-1147年），历时30余年竣工；崇圣寺三塔整体建造周期前后延续300余年（依据《崇圣寺三塔考古报告》及《云南通史·南诏大理国卷》考证）。这份跨越数百年、历经十余代人的营造工程，堪称大理先民书写的造塔史诗，彰显了其坚守初心、世代传承的执着精神。

如今，崇圣寺三塔已历经1190余年风雨，依然巍然屹立于苍洱大地。南诏与大理国时期，佛教被尊为国教，崇圣寺作为皇家寺院，是当时全国佛教信仰的中心，也是信徒顶礼膜拜的圣地。即便在现代社会，它仍是佛教信徒心中的精神家园，每年吸引数十万信众前来朝拜，印证了大理“妙香佛国”的历史美誉。

在建筑艺术与工艺水平上，崇圣寺三塔独树一帜。其风格融合了中原唐代佛塔的建造技术与云南地方民族特色：千寻塔的密檐式结构借鉴了唐代长安荐福寺小雁塔的营造工艺，但在塔顶金翅鸟、塔身佛龛造型等细节上，融入了白族、彝族的文化元素，这种“中原技法+本土创意”的融合创新，在全国古塔中极为罕见（《中国古代建筑史·西南卷》评）。工艺方面，砖塔砌砖平整光滑，灰缝均匀（实测灰缝宽度仅0.8-1.2厘米），塔体结构稳固，历经多次地震考验仍安然无恙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大理8级地震、1925年大理7级地震中，三塔仅局部受损，后经修缮恢复原貌，其抗震设计堪称古代建筑的典范。

作为研究南诏、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实物载体，崇圣寺三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。由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文献记载匮乏，三塔的建筑风格、装饰图案、佛像造型等，成为还原当时宗教信仰、社会生活、艺术审美，乃至经济技术水平的重要线索。与国内其他著名古塔相比，崇圣寺三塔兼具规模宏大、风格独特、文化多元等优势：相较于河南登封嵩岳寺塔（中国现存最早砖塔），其融合多文化元素的艺术价值更为丰富；相较于山西应县木塔（中国现存最高木塔），其砖塔建造技术的成熟度与耐久性更具代表性，二者同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。《中国古塔名录》将崇圣寺三塔列为“全国十大古塔”之一。

作为大理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，崇圣寺三塔融合了白族、彝族等多民族文化元素：白族传统的“三坊一照壁”建筑韵律融入塔身比例设计，彝族“火焰纹”“云雷纹”成为浮雕装饰的重要题材，体现了大理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特点。如今，崇圣寺三塔是大理州唯一的5A级旅游景区，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300万人次，景区内除三塔外，还有崇圣寺、雨铜观音殿等历史遗迹。崇圣寺三塔及苍山洱海的自然景观，形成了“文化+自然”的独特旅游体验，既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，也推动了大理文化的对外传播。

此外，崇圣寺三塔还为建筑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宗教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。通过对其建筑结构、建造技术、装饰工艺的研究，可深入探究中国古代砖塔的发展演变脉络，为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。

“当我们走近大理城时，可以依稀看到山麓上三座纤细高挑的古塔”。（美国：罗依·查普曼·安德鲁斯摄于1916年9月24日。）

梅城三塔：洱源的千年时光坐标与文化瑰宝

梅城三塔前的白族村庄（2025年1月4日摄）。

在大理州洱源县牛街乡金鳌山上，静静地矗立着梅城三塔（又称梅城石塔），它始建于大理国时期（公元937-1253年），是洱源区域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建筑遗存之一。

据清代《浪穹县志》及现代考古实测，梅城三塔原由三座石塔组成，呈半圆锥状依山而建，现仅存中间主塔，南北两座小塔已因风化侵蚀而不存，遗迹难辨。现存主塔高约30米（依据洱源县文物管理所2018年实测数据），共6级，层级分明，自底部向上由宽变窄，塔身下部与山岩相连，上部与山岩分离约5米，底层边长约10米。2025年1月4日，我探访时发现，主塔塔身石裂岩崩、凸凹不平，表面草木丛生，虽远观仍有古塔雄风，但近看已近似石峰插天。

梅城三塔的建造极具特殊性：金鳌山山体原为巨大石灰岩壁，经千万年风化雨蚀后，形成笋状石核，大理国先民巧妙利用这一自然地貌，经人工雕凿而成“天就人成”的石塔——塔身一半为天然岩石，一半为人工雕琢。《云南通志·古迹卷》载“石笋三峰如矗，浮图高十余丈，层级分明，凌空巉削”。这种将石窟寺营造理念与石塔造型相结合的建筑形式，在中国佛塔体系中极为罕见，它既保留了山体自然形态，又赋予其宗教象征意义，是古代建筑文化与宗教文化深度融合的独特产物。

历史文献对梅城三塔多有赞誉：明代《云南通志》称其“石笋三峰如矗，浮图高十余丈”；清代王芝成在《题梅城石塔》七律诗中写道：“巨斧何年劈五丁，凿开奇翠一峰横。青芙倒映明河影，铁锈寒风绿野晴”；康熙《鹤庆府志》将其列为“鹤庆八大名景”之一，详细记载“梅城石塔，梅有三百余株，环列成城，花时冉冉如白云初起，上有三石塔，负山屹立……中空如屋，游人从中空处扳援而上，至顶平广如文室，可坐六七人，洞穴俨如窗棂”。这些记载既印证了梅城三塔的历史风貌，也反映了其在古代厚重的文化地位。

梅城三塔开创了大理地区“依山造塔”的先河，是大理先民“天人合一”建筑理念的生动实践，在建筑风格、艺术价值与民族特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。历经1080余年，主塔依然矗立云端，雄风犹存。1980年7月3日，梅城三塔被洱源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10年，大理州文物局对主塔进行了局部加固修缮，清理了塔身杂草与松动石块，延续了其历史寿命。

凤仪东山三塔：山巅之上的岁月守望者

大理凤仪东山三塔，又称东山文笔塔，位于大理市凤仪镇东山（塔山）之巅，由三座砖塔组成，呈三角形排列，是洱海东南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。

三座塔均为方形密檐式砖塔：主塔高约10米，共7级；南北两座小塔高约8米，各5级（依据道光《赵州志》卷三《舆地志》及2019年凤仪镇文物普查数据）。据道光《赵州志》记载：“文笔塔，在州城东二十里东山，三峰屹立，势如文笔，故名。”查阅嘉靖《大理府志》、康熙《大理府志》、民国《大理县志稿》等文献，均未明确记载其始建与初毁时间。结合“南诏尚武，大理崇佛”的历史背景，以及塔身建筑风格与大理国时期砖塔的相似性，考古学界普遍推测其始建于大理国时期（公元937-1253年），与当时佛教为国教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，同时融合了当地的风水观念——三塔“势如文笔”，寓意“文脉昌盛”，与凤仪地区古代教育传统相呼应。

凤仪地区的行政建制历经多次变革：南诏时期为赵赕（公元738年始）；元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，赛典赤改赵赕为赵州；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，改三耳山为凤山；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改赵州为赵县；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依“凤凰来仪”之意，蔡锷派李根源治理滇西，改赵县为凤仪县；建国后，凤仪建制多次调整，现为大理市凤仪镇，辖区面积约为明代赵州的11.4%。

清代提学顾莼在《重建文笔塔记》中，详细记载了三塔与凤仪文风的关联：“赵治东文笔山，旧有三塔，遥拱黉宫，方是时，列科甲者日盛……康熙己卯解元郑嵩溪、戊戌进士李苍崖，继起者络绎，且有父子兄弟成进士者。乾隆乙未（公元1775年），谷西阿先生际岐选馆后，塔址就倾，甲科遂以稍替。嘉庆丙寅（公元1806年），汪衍二牧倡都人士协力重修，增其旧制，戊辰（公元1808年）杜芳洲湘遂成进士。”文中明确指出，当地士人认为三塔“助文笔、培风脉”，虽科举兴衰根本在于教育，但三塔的象征意义对地方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凤仪东山地处洱海断裂带（洱海海沟为中线，西接苍山板块，东连宾川板块），历史上地震频发：明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大理8级地震，依据《中国历史地震名录》，此次地震震级7.5级，烈度9度），崇圣寺三塔严重受损，东山三塔深受影响；清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6月、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8月，凤仪地区先后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；最具毁灭性的是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3月16日的大理7级地震（烈度9度），据《凤仪地震纪略》记载：“震声如迅雷，天崩地坼，屋覆坍塌，历时三十余分钟。主震后余震不断，又复大雨倾盆。震后地面、路堤、田中多有裂缝，宽三四寸至尺余，长数尺至数丈，缝中黑水细沙涌出……凤仪县城墙倒塌四分之三以上，城东受灾最重，房屋几乎全部倒平，天王寺全毁，东山三塔亦损毁倒塌。”此次地震成为东山三塔彻底倒毁的直接原因。

近现代以来，凤仪的区域地位逐渐变化：解放前后，大理州府迁至下关，凤仪部分区域并入下关镇，剩余区域划归大理县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北移至洱海周边；改革开放后，楚大高速公路通车，绕过凤仪直达下关，老320国道渐趋冷落，凤仪作为滇西交通支点的作用淡化，赵州昔日辉煌逐渐被淡忘。

凤仪东山三塔主塔遗址（2024年10月18日摄）。